

#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当代

主编 林兆荣 薛守琼

厦门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

主 编 林兆荣 薛守琼  
副主编 王岗峰 张华荣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9 号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

主 编 林兆荣 薛守琼

副主编 王岗峰 张华荣

\*

厦门大学出版出版发行

福建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1.5 印张 288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615—1079—9/B·33

定价: 15.80 元

# 目 录

## 一、总论

|                                          |       |
|------------------------------------------|-------|
|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 (1)   |
| 邓小平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发展·····                       | (16)  |
| 邓小平科学技术理论的文化学思考·····                     | (30)  |
| 试论邓小平对中国现代思维方式变革的影响·····                 | (40)  |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 (50)  |
|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br>重要哲学基础····· | (63)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                       | (79)  |
| 市场经济与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88)  |
| 教育·科技·生产力·····                           | (100) |
| 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                        | (109) |

## 二、辩证法

|                    |       |
|--------------------|-------|
| 哲学的社会功能·····       | (119) |
| 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     | (130) |
| 形而上学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 (143) |
| 诡辩论与辩证法·····       | (153) |
|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唯物辩证法····· | (160) |
| 系统理论与辩证法·····      | (173) |

## 三、认识论

|                     |       |
|---------------------|-------|
| 能动反映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属性····· | (182) |
| 认识是反映和创造性的统一·····   | (194) |

|                             |       |
|-----------------------------|-------|
| 关于认识过程的阶段及实践在其中的作用·····     | (207) |
| 现实的认识过程是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统一·····   | (218) |
| 符号与认识关系问题探要·····            | (223) |
| 试论集体主体的形成、结构和功能·····        | (234) |
| 结构与功能的分析：主体性研究的新视野·····     | (245) |
| 在主客体相互关系中把握主体性的结构·····      | (255) |
|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探要····· | (266) |
| 对不可知论的再思考·····              | (275) |

#### 四、历史唯物主义

|                      |       |
|----------------------|-------|
| 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初探····· | (289) |
| 理想本质的哲学思考·····       | (302) |
| 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范畴·····     | (315) |
| 宗教是复杂的文化现象·····      | (325) |
| 宗教是特殊的上层建筑·····      | (339) |
| 现代化与价值重建·····        | (350) |
| 后记·····              | (363) |

#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 王岗峰

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是在实践中坚持，在运用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它的科学理论价值在于，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对指导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且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它是活的哲学，是深悟哲学的精神实质，精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以及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能艺术地渗透、贯穿于社会实践中，形成总体的、战略的、辩证的领导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这种哲学已经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道路、方向、蓝图、方案、设计、规划和步骤。虽然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论著，但散见于他的讲话和

文章中的哲学思想，具有其内在联系，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脉相承。它把唯物主义彻底贯彻到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从一般的认识到立足于中国自身实践活动的认识论；是从一般唯物史观到改革开放的唯物史观；是从一般的辩证法到全面运筹、战略设计的辩证法。

## 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

邓小平作为一位坚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动摇。他的哲学思想最具特色、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它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哲学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和阐述。

首先，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归纳为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sup>①</sup>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整个世界处于相互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辩证关系之中，人们要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逐步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使主观认识与客观的实际相符合。实事求是的内容正是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

动的向导。”<sup>②</sup>

其次，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他认为毛泽东所论述的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精华，体现着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sup>③</sup>；实事求是强调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只有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才能找出事物固有的客观规律性，这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从物到感觉进而上升为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另外，实事求是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二者关系的一种根本立场和态度，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集中概括和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sup>④</sup>。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路，“实事”的含义必然包括客观存在的矛盾，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矛盾是普遍的。但是，“实事”又是以各种具体事物的形式存在的，它是特殊性的东西。而“是”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它是普遍的、共性的东西，是存在于具体的、特殊的“实事”之中。因此，在中国革命的“实事”中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精髓所在。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作坚决斗争。“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sup>⑤</sup>。邓小平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理论为例，说明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具体情况独辟革命具体道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所以，实事求是是从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指导下，在探索中国式的



革命道路中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人走中国式道路的精神武器。邓小平从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态度出发，进一步引伸出我们必须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批评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观点。指出这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真正高举就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因此，邓小平作出论断：“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sup>⑥</sup>

再次，邓小平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漫长岁月中，毛泽东同志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了坚决的斗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重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体现了革命胆略与科学精神的相统一。“我们讲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sup>⑦</sup>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始终站在理论与实践的前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略，反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打破那些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时代、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又是相一致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sup>⑧</sup>思想僵化，只会导致与实际相脱离，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与实际相符合，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如果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即使是大胆的决策和规划，也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充其量只是盲目的主观臆想。只有实事求是，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使革命胆略

有了科学的客观基础，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实事求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精髓。实践证明，最根本的社会实践是发展生产力，为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要解放思想，一切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才能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邓小平正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把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形成独具风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始终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二、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

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同志辩证法思想的特殊风格，即把马克思

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国化，使其有中国的特点，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以适合现时代我国现实的需要。

1. 关于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辩证法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进行第二次伟大而深刻革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是因为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内在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邓小平指出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坚持和发展。“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sup>⑤</sup>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进行的。由此可见，两个基本点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如果只讲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会失去保证，偏离方向；如果只讲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改革开放，那我们的经济就会失去动力，社会就会失去活力，没有动力与活力，四项基本原则就会落空。

2. 防“左”与反右。在通常意义上，人们的认识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超越时空就是“左”，落后于时空就是右。邓小平关于“左”与右的论证，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辩证性。他认为针对解放思想有“左”与右的倾向，针对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有“左”与右的倾向，必须具体分析。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

误。后来有人借解放思想，搞自由化，这是右的错误，当然也要纠正。僵化保守是改革开放的阻力。通常，僵化保守一般是同右相联系。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僵化保守则是“左”的东西，是我们一些同志把以往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个别判断看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加以固守，且至今不能解脱，以致表现为“左”的僵化保守了。否认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是右的表现。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左”的影响主要指党内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右的影响指社会上也有极少数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并受到党内个别同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对于错误思潮的危害性及其防范、回击，邓小平同志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说，只提反“左”不提反右，就会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但当前主要是反“左”。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左”的危险和我们应采取的态度。他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3. 保证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对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他十分重视民主，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民主就无法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无法

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提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如何创造民主的条件，邓小平重申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强调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为保障民主，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法制，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一方面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反对以党治国。另一方面也反对不要社会主义法制，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坚持以法治国。既把民主作为法制的内容和基础，又把法制作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邓小平还把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同社会主义建设相联系，采取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方法。他说，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针对目前法律很不完善的状况，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他提出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有总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可见，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既不是从马列书本中抄来的，也不是从别国经验照搬来的，而是从中国建设与改革实践的实际情况中应运而生的。

4.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过去我们固守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给“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僵硬传统观念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了市场经济。十二大报告中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反映了这一思路。后来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又进一步提出“应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反映了这一认识上的进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

巡谈话把“市场经济”的问题讲得更简明更透彻：“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sup>⑩</sup>邓小平不愧是解放思想的表率，始终站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以至无穷，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十四大确立新的经济运行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

5. 先富与共同富裕。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确定发展的不同层次与顺序，最终达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不平衡性与渐进性规律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阐述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发展观。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要使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但是，中国的具体国情是不允许在相同的时间里实行共同富裕。首先是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区别，有的自然条件好，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条件成熟，有的则交通闭塞，气候、水土条件差。有的科技文化事业发达，人才素质高，有的文化落后，劳动者素质差，这就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其次，从个体上看，每个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有差别，劳动的质量、数量有很大差异。因此，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必然造成一部分

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起来，这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邓小平多次谈到应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先富起来。但是先富起来不是造成两极分化、而是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⑩</sup>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渐进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配上的不平等和逐步富裕。从不平衡到平衡，从不平等到平等，从渐进到突变，从逐步富裕到共同富裕，这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全体人民一心一意把生产力搞上去。

6.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地作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这是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是重点论。但是，光抓物质文明建设还不够，还要抓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两点论，是重点论与两点论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多次论述这二者的关系。他在1982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谈到，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这一手，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要失去方向，肯定要失败的。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又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成功也无意义。1989年“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又说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指出这是两点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再次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抓打击经济犯罪，抓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⑪</sup>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包括法制建设、思想

建设、党风建设，他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好，提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来认识。

上述几个方面仅是邓小平辩证法思想中最耀眼的几朵鲜花，他的经济、政治、政党、军队、法制、文化等思想方面，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挖掘。

### 三、邓小平彻底的、辩证的唯物史观

邓小平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于经济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并在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把生产力发展状况作为评判我国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准，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邓小平总结了多年来束缚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sup>①</sup>“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②</sup>邓小平的科学论断，突出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是首要的、主要的特征。这就准确地把握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决定力量的观点。邓小平这种思维方法，也使得我们摆脱以往拘泥于是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倾向。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邓小平肯定了党的十三大阐述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阶段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sup>④</sup>这是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国情，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状况及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状况得出的科学论断。我们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落后和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不仅存在多种形式的公有制，而且存在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封建主义残余、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国情分析和历史阶段的判断形成强烈的反差。以往要么宣布共产主义实现不是遥远的将来，从而狂热地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要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因而发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判断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在于对国情的分析忽视了生产力比较落后和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事实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事实的决定的、制约的作用。因此，在制定政策上犯了“左”的错误，对外关闭自守，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反对“左”的错误，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思